

# 抗战文学研究的概况与问题

秦 弓

---

---

**内容提要** 本文评价抗战文学的价值及其历史地位,回顾抗战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此基础上,指出抗战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抗战文学的价值估量不足,二是对正面战场题材关注不够,三是研究视野尚嫌狭窄,四是比较框架有待建立。作者认为,在宽广的视野上以历史主义态度重新考察抗战文学,一定会大有可为。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入,不仅会推进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面把握,而且有助于丰富世人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认识。

**关键词** 抗战文学研究 概况 问题

---

---

中国现代文学从其诞生开始,就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抗日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必然在现代文学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作家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创作状态,文学题材、文体样式、审美格调,文学中心的重新调整,文学传播方式的变迁等等,都能够见出抗战带来的深刻影响。现代文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抗战的整个进程,作为战斗的号角激励着中华民族浴血奋战,作为写实的镜子反映出抗战时期的历史风貌,作为文学的富矿珍藏着光荣与耻辱、喜悦与悲怆交织的民族记忆。就时段而言,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全面抗战8年有余,占现代文学史的四分之一;如果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的抗日文学算起,连同抗战胜利后的抗战题材的创作在内,时间跨度

可谓占现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无论是其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还是丰富的文学史意义,抑或时间跨度之大,抗战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毋庸置疑。然而,事实上,关于抗战文学的研究却不容乐观。<sup>①</sup>

## 研究概况

抗战文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之后对抗日题材的评论,如沈起予《抗日声中的文学》、钱杏《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茅盾《“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学》等。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着抗战文学的展开,文坛对抗战文学应该承担的任务、抗战文学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等,不断地进行探讨与总结,代表性的成果有胡风的《民族战争与我们——略论三年来文艺运动的情势》、罗荪的《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郑伯奇的《略谈三年来的抗战文艺》、葛一虹的《抗战戏剧的特征及其三年来之战斗成果》、艾青的《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以群的《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余上沅、何治安的《抗战四年来的剧本创作》、王平陵的《抗战四年来的小说》等。如果说这些成果多属评论性质的话,那么,1944年完成、1947年上海现代出版社出版的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则称得上系统的文学史研究了。蓝海本身就是抗战文学主潮的弄潮儿,编辑《报告》《微波》等刊物,主编《东方文艺丛书》,并出版自己的杂文集《情虚集》《发微集》、《夜间相》。他对抗战生活有着切身感受,对抗战文学建设有着实际经

<sup>①</sup> 本文所说的“抗战文学”,主要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1937.7-1945.8)的文学,涉及在此前后的抗日文学时,文中有所说明。

验,熟悉战争氛围与身边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其《中国抗战文艺史》具有浓郁的现实氛围。但是,由于写作时抗战尚未结束,缺乏历史研究所需要的时间距离,并且在战争环境下,了解全局情况颇有难度,因而,无论是资料占有,还是分析与评价,都给后来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抗战胜利后,由于很快就爆发了内战,只留下了不多的抗战文学回顾与匆促的总结。

1946年初,冯雪峰、茅盾等人就已经开始批评国统区的“右倾”。<sup>①</sup>新中国成立后,本该对抗战文学予以全面而认真的总结,但是在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的政治氛围下,现代文学史研究必须承担的这一历史使命却只能被悬置起来,即便是浮光掠影的描述,也少得可怜。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抗战文学研究带来了重新启程的契机。重庆、桂林、成都、天津、河北、陕西、武汉、上海、河南、南宁等地先后成立地区性抗战文学研究机构,创办《抗战文艺研究》、《延安文艺研究》、《晋察冀文艺研究》等刊物,举办抗战文学学术讨论会。史料发掘、整理工作成绩显著,已经出版的有四川社会科学院编《抗战时期文艺期刊篇目索引》及其续编,武汉市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武汉文学艺术史料》三辑,上海社会科学院主编《上海孤岛文学资料丛书》,重庆师范学院编《国统区文艺资料丛编》,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等编《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11种,文天行等编《作家战地访问团史料选编》,苏光文编《抗战文学纪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20卷,《中国

①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1-3期,1946年1、2月;茅盾:《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

解放区文学书系》20卷,《延安文艺丛书》16卷,钱理群主编、封世辉、黄万华副主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等。

抗战文学研究亦有一些成果问世,专著有朱德发执笔的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修订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苏光文《抗战文学概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大后方文学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魏华龄《桂林文化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增杰《中国解放区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屈毓秀等《山西抗战文学史》(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章绍嗣等《武汉抗战文艺史稿》(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王剑青、冯健男主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桂林抗战文艺辞典》(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胡凌芝《蹄下文学面面观》(长春出版社1990年),冯为群、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黄万华、申殿和《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李建平《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漓江出版社1991年),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黄万华、徐祥《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文天行主编《中国抗战文学概览》(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靳明全、宋嘉扬、郝明工、潘成菊《重庆抗战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2003年)等,另有《国统区抗战文艺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4年)、《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出版社 1992 年)。<sup>①</sup>

## 存在的问题

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抗战文学研究成果可谓不少,然而,与总计 220 种以上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相比,只不过占十分之一左右,这与抗战文学在时段上至少占现代文学史的四分之一相比,显然不成比例。数量偏少的背后,隐含着一些深层的重要问题。

### (一) 对抗战文学价值的估量不足。

前面提到的国统区抗战文学“右倾”论,曾经影响到对抗战文学的整体估价。经过 80 年代的讨论,这一责难基本上得以澄清。可是,目前仍有为数不少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既然是文学研究,就要关注文学价值,而抗战文学大多为急就章,文学价值不高,不值得投入许多精力去研究,即使加大投入,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

文学研究的确应该关注文学价值,但文学从来不是只有审美形式要素的单晶体,而是包含着社会、文化、心灵、审美等诸多要素的复合体。文学如果抽去历史、文化与心灵内涵,纯粹倒是纯粹了,可也就成为没有血液与呼吸的时装橱窗里的模特了。

抗战文学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从 1895 年陡起峰峦的台湾抗日文学,经清末民初大陆流行的“国难小说”、忧时诗词,到“九一八”、“一·二八”激起高潮的抗日文学,再到伴随八年抗战全程以及胜利后仍有延续的抗战文学,记录了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终于奋起反抗、赢得最后胜利的悲壮历史,折射出这一

<sup>①</sup> 参照章绍刚《中国抗战文艺研究概述》,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上),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时期中国人心灵的创伤史、成长史。中国素有以诗证史的传统,要想全面把握甲午战争前后大陆与台湾的血脉亲情与割裂巨痛、尤其是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与历史细节、国民性的耻辱与光荣、委顿与觉醒等,抗战文学是不可或缺的考察对象。

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提出启蒙与救亡消长说,认为抗战爆发之后,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启蒙便隐去了。当80年代强调启蒙价值的时候,这种观点给抗战文学的估价带来一定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始终交织在一起,启蒙任务的提出,即缘自救亡的需要。五四时期启蒙思潮高涨,正是鲁迅留学日本时所设计思路的实践:“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见,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sup>①</sup>也就是说,个性解放潜在的最终指向仍是民族解放。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抗日的确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一主旋律不是单色音调,而是救亡与启蒙紧密交织的复合音调,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尤为明显。有的作家双管齐下,两条主题线索均有创作,如曹禺既有抗战剧《蜕变》,也有批判旧式家庭、主张个性解放的《北京人》;巴金既有抗战小说《火》三部曲,也有《家》的续篇《春》《秋》。有许多作品则是双重主题变奏,短篇小说如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与《在医院中》,长篇小说如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巴金的《寒夜》与老舍的《四世同堂》<sup>②</sup>等。

对现代文学史上抗战文学范畴的认定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上只是抗战时期的抗战题材文学,广义则应该包括更为丰富的内容。从历史的延长线上,前有台湾抗日文学、清末民初的国难文学、“九一八”以后大陆的抗日文学,后有40年代后期的抗战题材

① 鲁迅:《文化偏至论》,初发1908年8月《河南》月刊第7号,署名迅行。

② 《寒夜》与《四世同堂》均完成于抗战胜利之后。

文学。从抗战时期的广度来说,抗战题材包括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题材,民族受难(难民逃难、受戮、被奴役等)题材,敌方题材,大后方直接与抗战相关的题材(兵役、后方医院、后勤供应、官吏腐败、投机者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等),借古讽今、鞭挞投降与分裂的历史剧;除此之外,还有表面上与抗战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题材、日常生活题材,如历史题材的《伍子胥》,故乡追忆的《呼兰河传》,谈生活趣味的“雅舍小品”等。表面上没有直接关联,实际上有着内在联系。抗战时期作家流亡,才有了对伍子胥历史故事的深刻体验,因而才能创作出那样一种情调悲怆、节奏逼促,表现出对生命与历史具有深刻感悟的作品。乡土追忆并非萧红的个人创作行为,而是一时的风气,这是因为作家眼见山河破碎,亲历流离失所,才对故乡倍加思恋。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很大程度上是对封建宗法制与封建礼教的批判,而抗战时期的乡土文学虽然也有这样的内容,但其比重明显缩小,追忆带有甜蜜的忧伤、暖人的温馨。即便是似乎要以创作实践来证明抗战时期也可以创作“与抗战无关”之作的《雅舍》,也能够看出作者在抗战中以苦作乐的苦趣。至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则既有抗战内容,也有生活趣味,二者相互交织,相得益彰。

内涵如此丰富的抗战文学,怎么能说价值不高呢?

即便说艺术水平,较之抗战之前也有了长足发展。报告文学这一后起之秀有明显的进步,正如以群在《抗战以来的报告文学》<sup>①</sup>中所说,由平铺直叙到提要勾玄,由记录直接的经验到表现综合的素材,由热情的歌颂到冷静的叙写,由战争的叙述到生活的描写,由以事件为中心到以人物为主体,经过抗战的淬火,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真正成型了。“鲁迅风”杂文风骨铮铮,历史杂文

① 《战斗的素描·代序》,作家书屋 1943 年版。

空间辽阔,历史与现实交汇,幽默、讽刺、机智、反语等手法运斤成风。记叙抒情散文写法更趋多样化,刚健、深沉风格尤显突出。《八十一梦》代表了现代寓言体小说的成熟,《荷花淀》、《伍子胥》、《呼兰河传》显示出诗性小说的诗性魅力,《财主底儿女们》拓展了心理世界的描写空间,直逼心灵深处的真实,显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令人惊悚的笔力。《寒夜》、《淘金记》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攀上了一个新的巅峰。通俗小说在叙事方法的现代性转化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雅俗交融在张恨水、张爱玲等作家的创作中显示出新气象。30年代的代表诗人艾青,气势更为雄浑,笔力愈加遒劲,艺术手法丰富多样,写出了《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其音乐感、画面感及其参与生成的象征美具有强烈的感人魅力。七月诗派激情充沛,格调刚健,气势磅礴。冯至等诗人成功地完成了十四行诗中国化的实验,提升了新诗的审美境界。“中国新诗派”也在战火中锻炼成熟,其代表诗人穆旦经历过赴缅作战九死一生的考验,诗艺的精粹和对战争与生命的哲学思考深度,堪称40年代新诗的又一座高峰。曹禺的《北京人》,以浸透了抒情味的日常生活写实发掘人的精神悲剧,实现了向契诃夫式的生活化戏剧的跨越。话剧真正为广大中国观众所接受并喜爱,当归功于抗战背景下的广场话剧与剧场话剧的双重勃兴。

可以说,抗战的全面爆发虽然改变了某些文体发展的道路,但并未终止文学的前行步履,反倒大大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艺术空间,其审美价值不容低估。

## (二) 对正面战场题材关注不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抗战文学研究局限于根据地文学、国统区文学、上海“孤岛”与港岛文学,近年来,沦陷区文学也被纳入学术视野。区域的划分自然有其历史根据与研究上的便宜之处,地区



抗战文学研究也的确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既然是一场战争,就必然有战场,文学是否反映了战场,表现的角度与内容怎样,都值得认真考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战场多为敌后战场,至于正面战场题材则仅用眼角余光一瞥而过,即使偶或涉及,能够公允评价的实属凤毛麟角<sup>①</sup>,大多则往往缺乏历史感。有的只说抗战文学肯定了国民党部队下级军官与士兵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有的片面强调文学对军事溃败的批判,如一部地区文学史著作本已在部分章节里难能可贵地肯定了国民党部队的一些战绩,可是在论及叙事长诗《桂林的撤退》时,却又说长诗“着重描写了在日本侵略军面前,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从桂林怯懦逃跑,以及由此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与痛苦”。<sup>②</sup>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固然应该批评,但据此认定溃退的国军为“反动派”,则明显有违事实真相与历史逻辑;人民的深重灾难归根结底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把它完全归罪于我军的溃退,正所谓李代桃僵。

抗战文学研究中正面战场题材的严重阙失,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同整个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中历史主义的缺席直接相关。在中国大陆至少两代人的抗战历史“记忆”中,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抗战无功,摩擦有术。现实生活中,许多曾经在抗日前线冲锋陷阵的正面战场官兵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如参加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甸作战的诗人穆旦,在敌人围追堵截与野人山瘴气暴雨毒蛇蚊蚋横行的死亡线上死里逃生,1958年却以“历史反革命”的

① 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第12章关于赞颂国民党抗日将士作品的认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修订本),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452页。

② 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05-506页。

罪名被判劳动管制三年。所幸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民族智慧与历史要求渐渐苏醒,抗日战争的历史面貌逐步复原。南京等地人民政府为正面战场牺牲的抗日英烈颁发证书,新闻媒体采访当年正面战场的抗日军人,称之为“爱国军人”,正面战场作战的纪念性建筑得以新建或恢复。尤其是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实现国共两党历史性的会谈之后,大陆对正面战场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大幅度增强,过去只有负面形象的杜聿明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抗战功绩得到肯定。

事实上,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有“兄弟阋于墙”的一面,但主要的方面还是“外御其侮”。抗战分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敌后抗日武装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国民党部队也有转入敌后战场的,但就其主体而言,则支撑着正面战场。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与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两个战场彼此需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才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正面战场大型会战有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会战等22次,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斗近5万次。陆军伤亡、失踪达320万人,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牺牲4000余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sup>①</sup>牺牲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50余名<sup>②</sup>,如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九军军

① 参照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另有211名、120名二说。

长郝梦龄、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师长有赵登禹、王铭章、饶国华、刘家麒、戴安澜、王竣、寸性奇、彭士量、许国章等。其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殉国后被追封上将军衔的至少有8位,将领以下团、营、连、排长数以万计。正面战场歼灭日军约53万人,连同受降日军128万多人、伪军104万多人,正面战场共消耗日伪军285万多人。击毙(或击落飞机使其毙命)日军将领40人以上,其中有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等。

正面战场的作战,重创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了“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从1938年12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时间里,日本内阁像走马灯一样连续更换了7任。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对敌后战场的建立、发展起到了支援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协同作战,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顽强意志、必胜信念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能力,使国际社会刮目相看,赢得了美、苏的航空支援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苏更大规模的宝贵支持,为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直至打败法西斯阵营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后来中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地位,与正面战场的抵抗密切相关。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文献中就已对两个战场的区分有明确的认同。193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分析八路军一年半所取得的战绩的原因时说:“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sup>①</sup> 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

① 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444页。

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sup>①</sup>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正面战场壮烈殉国的张自忠、王铭章、戴安澜等高级将领,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如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题赠给台儿庄战役中战死在滕县的王铭章将军的挽联是:“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殉国于第一次赴缅作战,毛泽东赠送的挽词是:“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的挽词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人民群众尽管对正面战场一些部队的不战而退与军纪混乱颇有怨艾、甚至愤恨,但总体上来说,对正面战场寄予厚望。当正面战场传来捷报时,人民欢欣鼓舞;当正面战场遭受挫折时,人民为之痛苦、忧心。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台儿庄大捷飞传四海,徐州人民慰劳作战官兵,赠送写有“民族救星”的锦旗。

在整个中华民族都动员起来的抗战中,天性敏感的作家怎么会对正面战场无动于衷?老舍在《火葬·序》里说得好:“历史,在这阶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睛过日子,假充胡涂。”中国作家在抗战中没有闭着眼睛假充胡涂,而是热切地关注抗战,积极地投身抗战,书写了大量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作品。抗战文学正面表现正面战场的战略方针、前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12册,第240页。

线战况与战局的发展,热情歌颂正面战场官兵浴血奋战的爱国胸襟和牺牲精神,如实描写战事的惨烈以及军队建设、军民关系等相关细节;与此同时,也揭露了战略与战术的不协调、旧军队遗留的军阀作风以及个别部队的怯战溃逃等弊端。正面战场文学与敌后战场文学共同描绘出抗日战争的壮丽画卷,同表现沦陷区、大后方、敌后根据地、日据下的台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孤岛”与香港的文学一道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全景图。

由于战争局势的发展,也由于国民政府在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之后不断加强文化统制,排挤异党力量,国共摩擦时而加剧,妨碍了更多的作家对正面战场的倾力表现,加之作家生活方式与前线生活仍有相当距离等原因,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的表现不如抗战前期那样声势浩大。但总体来看,作家为表现正面战场做出了艰辛的努力,甚至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

今天,当我们拨开迷雾,重读这些融入了作家的热情与激愤、也凝结着作家的鲜血与生命的作品,我们被带回到硝烟弥漫的历史现场,为英烈的浴血奋战与悲壮牺牲而强烈地震撼,为现代文学能有如许不辜负时代的巨大建树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现代文学界对正面战场文学发掘与研究的迟缓而深感惭愧。

我们应该珍惜这笔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宝贵财富,我们有责任发掘、整理与出版史料,全面启动关于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并将其不断推向深入,藉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历史面貌的全面恢复做出应有的贡献。

### (三) 研究视野尚嫌狭窄。

正面战场文学亟待开掘,譬如一系列重要战役有着什么样的文学表现,抗战名将留下了怎样的文学形象,作家与正面战场的关

系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正面战场文学在整个抗战文学中的地位,等等。

除此之外,抗战文学研究还有许多工作值得去做,诸如一些事件(如南京大屠杀、日军细菌战毒气战、重庆大轰炸、汪精卫投降等)在文学中是怎样表现的,文学表现与历史事实是否吻合,不同方面(敌我双方、我方各派)的表现有何差别;抗战时期作家生存状况与创作状态怎样,较之战前有哪些主要区别,前线文学与大后方文学、正面战场文学与敌后战场文学有那些差异与联系,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各阶层对抗战文学的接受情况,抗战文学对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二个十年的继承与超越,等等。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相当开放,文学活动十分活跃。1938年10月27日武汉失守之后,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有所收紧,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具有延安倾向的文化人一时间在重庆、桂林等地感受到沉重的压力。文化政策的开放与紧缩,给抗战文学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因此,认真研究文化政策的变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抗战期间,随着日军步步进逼,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机构不断迁移,知识分子处于民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流徙的颠簸之中,文化中心呈现出多元化状态。长春、北京、上海、武汉、金华、桂林、昆明、重庆、延安、香港等地,分别在沦陷区、前线与后方承担着文化集散地的功能。目前,北京、上海、桂林、重庆、武汉抗战文学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他地区的研究则较为薄弱。延安文学研究历史最长,成果本该最为厚重,但事实上由于种种局限,平面重复较多,深入拓展不足。重庆、延安、桂林等文化中心各自有些什么特点,相互之间有着怎样的复杂关系,各种特点与关系怎样深刻地影响了

抗战文学以及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启蒙题材与抗战题材是抗战文学的两只翅膀,二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启蒙本身也分为人性、个性启蒙与民族意识启蒙,有时两种启蒙紧密交织在一起。人性、个性觉醒怎样走向民族意识觉醒,国民性中的国家意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轨迹,抗战文学对此是如何表现的,目前只有个别作品的研究而缺乏整体性的概括。

有一些主观性很强的本质论、中心论一直影响着抗战文学研究,譬如因为强调抗战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胜利,就忽略正面战场文学;因为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作用,就对国民党系统的作家的作品关注不够,甚至加以曲解、批判;因为强调新文学为现代文学的中心,就对抗战中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评价不高,等等。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把多元的本质单一化,把本来是相对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绝对化,问题似乎变得简易了,然而却模糊了历史真相,背离了文学史研究的使命。抗战领导权问题在海峡两岸以及大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姑且不论究竟是哪一方面领导抗战文化乃至整个抗战走向最后胜利,在当时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民党系统作家的抗战作品无疑是抗战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应纳入学术视野予以公正评价。抗战期间,通俗文学作家加大了向新文学迈进的步履,新文学作家有意识地创作通俗形式的文学作品,雅俗交汇,互动相融,文学大众化从论坛上走进实践中,给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在抗战中激发出新的活力,知识分子深入民间采风、汲取民间文学养分,创作出歌剧《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那样的优秀作品,充分说明民间文学对于新文学的重要作用不可小觑。

以往抗战文学研究多从题材及其社会意义着眼,其实,由于战争的洗礼,作家对宇宙、自然、生命有了新的理解,抗战文学在描写

战争生活的同时,也包含着深邃的人性内涵与生命哲学内涵,穆旦的《森林之魅》就是后者的代表。这种内涵亟待深入发掘。

有些人只看见抗战初期的呐喊与控诉,便断言抗战文学有抗战而无文学。实际上,正如前面所说,抗战文学为现代文学史增添了许多艺术新质,其审美研究空间广阔。不仅艺术建树值得肯定,而且艺术上的探索也应该予以认可。试想,如果老舍没有抗战时期多部话剧的尝试、摸索,怎么会有后来炉火纯青的《茶馆》面世?

#### (四) 应该建立比较研究的框架。

中国抗日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文学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抗战文学研究应该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进行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话题有很多,譬如:战场(前线)文学,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高级将领题材,英雄题材,民族败类题材,战俘题材,兵役题材,女性题材,儿童题材,战争遗孤题材,战争中的人性题材;战后的战争文学对战争期间文学的超越,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的关系,等等。这些话题在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亚洲其他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之间,均有很大的比较空间。

中国台湾 1895 年即沦为日本殖民地,东北地区 1931 年亦沦陷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之下,日本对台湾与东北的侵占、奴役与掠夺,激起了强烈的反抗,也给民众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这些在文学上都留下了浓重的投影。台湾与东北的情况同 1910 年朝鲜的被吞并颇多相似之处,因而应该进行比较研究。

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与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在战争动员宣传等方面有着怎样的差异,在作品中怎样表现作为敌国的对方;作为战胜者的中国与作为战败者的日本,战后怎样保留与建构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等等,都是有意义的比较话题。



中国抗战文学中如何表现欧洲战场、北非战场与太平洋战争，如何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等，也值得关注。

在中国文学史脉络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与当代文学抗战题材、现代抗战文学与近代以来的国难文学、现代抗战文学与古代文学史上的爱国文学等之间，亦可展开比较研究。在宽广的视野上重新审视与深入考察抗战文学，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抗战文学大有可为。

(作者秦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

## 《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

中华书局2006年11月出版了陈丽菲著《日军慰安妇制度批判》，25万字。全书分8章，介绍了日本慰安妇制度的起源、实施、扩大及中国妇女的受害情况。书中还有专门章节介绍了战后对慰安妇的调查与赔偿，并提出了日本在此问题上的战争责任。